

三、從「六四」回歸「八九」

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楊開煌主任兼教授主稿

- 「八九」運動和「六四」事件必須區分，「八九」運動是民間社會的運動，而「六四」是純粹的政權作為。「八九」運動是一場複雜多元的群眾事件，包括對官僚腐敗的不滿等，並非單純政治事件。
- 在「八九運動」之後，中共政權開始不同的執政軌跡：繼續社會主義市場化的改革、集體領導、接班制度、學習型政黨、資本家入黨及領導問責制等，直到如今的反腐肅貪、網路舉報、深化改革等，或是從歷史經驗學到的執政教訓。

（一）前言

自 1989 年 6 月之後，對外界而言，中國大陸當年的「八九」運動，就被「民主」、「自由」、「反專政」的口號所固化；而「六四」事件就被「屠殺」、「鎮壓」等名辭所佔據。對中共官方而言，也就簡單的定位為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之爭，雙方詮釋權的爭奪一直沒有平息。然而，這是一場複雜多元的群眾事件，絕不僅僅是政治事件而已。

（二）多元視角

第一，「八九運動」從參與群體來看，1989 年的社會運動不僅是一場學生運動，而且一場範圍廣泛的社會運動，參與者包括工人、個體工商業者、國家幹部、教師和其他社會群體，甚至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各部委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、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機構，特別包括「人民日報」、「光明日報」、新華社等「喉舌」均有官員參與。北大的汪暉教授在「一九八九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與『新自由主義』的反歷史解釋」乙文中，提出當年改革是形成所謂「雙軌制」開始，為腐敗和官倒提供契機，結果改革引起國家與社會的對立，地方和中央的對立，中央部門間利益對立和矛盾。因此有龐大數目的公民懷念改革前相對的「穩定生活」。因為改革的政策造成若干舊官僚變成新

權貴，而中共中央對此沒有對策，結果外失民心，內失團結，最後是中央不和而引發的運動到悲劇。

第二，「八九運動」從訴求來看，不是為了政治改革或是西方民主的追求，顯然，在運動的開始與民主無關，而與社會的相對不平等有關，當時的口號如：「毛澤東的領導兩袖清風，華國鋒的領導無影無蹤，鄧小平的領導百萬富翁」，這是社會主義的訴求，為什麼運動開始矛頭直接對準當時社會上的富人，當時的富人主要是倒買倒賣致富的人，即所謂「反官倒」。所以，運動的開始是「行政訴求」，而非政治訴求。有人說到運動後期，學生們知道運動必將失敗，才臨急換上民主的口號，目的是博得歐美國家的支持。然而也可能是西方國家介入下的指導棋，將之轉變為「和平演變」與「反和平演變」的「政治訴求」，最終導至悲劇收場。

第三，「八九運動」從領導階層來看，如果運動的本質是社會不公，行政失能，則運動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由大學生來扮演，有資料顯示當工人試圖接近指揮部的時候都會遭到學生們的拒絕，而未能獲得運動中的領導權。但是問題是工人為何願意屈居學生之下，顯然學生是有人支持，工人沒有人支持，那麼為什麼學生有人支持，是誰在支持，而且是長時期、大力度的支持，怎樣支持，支持的目的又是什麼。這些問題均待釐清，因此，有人提出「八九民運主體僅僅被再現為唯一在場的『六四』學生領袖，遮蔽了工人階級的存在。」不是歷史的真象而是政治的需要，而且是各方政治的需要。

第四，「六四」事件相對於「八九運動」可能簡單許多，不過這是中共中央必須思考的問題，外界當然可以施加壓力，但是也必須思考目的和目標，否則也不會有續航力。

（三）世界鉅變

廿一世紀以來，人類社會面臨三大鉅變，快速地改變人類的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發展，它們是中國大陸崛起，網路科技和氣候變遷，這三件是都具全球性的意義，迫使人們必須以不同於以往的視野來審視過去來。這三大鉅變指向同一個命題：世界不是一元的，不是單一

的，不能只信一種標準：中國大陸崛起告訴世人，國家現代化不是只有西方一個路徑，還有中共的路徑，評價政治的標準也不是只有選舉民主與非選舉民主，還有良治與劣治，能治與庸治的標準。

中國大陸的崛起，如果放回「八九運動」的角度來看，我們可以發現在「八九運動」之後，中共政權開始不同的執政軌跡：繼續社會主義市場化的改革、集體領導、接班制度、學習型政黨、資本家入黨，領導問責制，直到如今的反腐肅貪、網路舉報、深化改革等，無一不在提高其執政能力化解人民的不滿，當然人民永遠也不會滿足，但只要不斷作出使人民有感的努力，政權的主危機就可以化解，顯然中共政權自「八九運動」中學到寶貴的執政經驗。